

试论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实质

乔毅民

从共产国际解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斯大林始终不相信中国革命会取得胜利，因而也始终没有放弃同蒋介石国民党的合作。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而其实质是要保持在中国取得的特殊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召开的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决定了战后世界格局：美国想称霸世界，苏联想继承沙皇衣钵。美苏对峙，两大阵营形成。在美苏争霸中。以牺牲中间地带为代价。在远东则是以牺牲中国为条件，相互争夺，相互利用。《雅尔塔协定》就是美、英、苏背着中国所作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一笔交易，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丑恶表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企图继承沙俄在中国的利益。因为“俄国世世代代就以统治亚洲各国人民为目的，其统治中国北部人民的企图最为坚持不懈。苏联继续实行这种政策，企图扩展它的势力，甚至想外蒙、内蒙、新疆和满洲脱离中国。”^①美国长期企图独霸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步形成了美国支持蒋介石国民党，进而控制中国的局面，致使苏联在中国问题上的打算受到严重威胁。因此，美国与苏联在中国争夺权益形成尖锐的矛盾。为达到各自的目的，美苏都想依靠蒋介石国民党来控制中国。

美国的对华政策只承认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抗战胜利后，美国给予蒋介石以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用以发动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以便把中国拉到美国一边，来对抗苏联。杜鲁门总统1948年3月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声称：“美国政府是帮助蒋介石应付它所面对的情况，……如果可能做到的话。我们不愿意在中国政府中或任何其它地方的政府中有任何共产党人。”^②《芝加哥太阳报》在呼吁国会抵制军事援华法案时指出：“全世界都认为，这个法案将把中国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使中国成为反对俄国武装集团的一个组成部份，事情的实质就是这样的。”^③苏联同样也把希望押在蒋介石国民党身上。苏联认为战后中国的统治者必然是蒋介石，理所当然地合作的对象是国民党。1945年2月，斯大林与罗斯福谈话时指出：共产党应接受蒋介石领导。1945年4月，斯大林发表了如下声明：（1）赫尔利大使向他申述的美国对华政策，他无条件地表示同意；（2）苏联政府将支持这个政策；（3）尤其对立即采取行动从事于统一中国武装军队并完全承认蒋介石委员长领导

下的中国国民政府，我们将有他的完全支持一点……”^③1945年5月，斯大林与哈利·霍布金斯在莫斯科的讨论中再次声明：“蒋委员长是中国唯一有资格担负起统一中国的领袖；中共的领袖不如他或不够资格负起责任。”^④因而，苏联政府1945年8月6日通知蒋介石派人到莫斯科紧急磋商对日宣战和实施波茨坦会议条款等问题。蒋介石立即派出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等前往莫斯科。在这次会议中，斯大林以承诺不支持中共，承认中国只有一个军队、一个政府为条件，换得蒋介石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协定中承认外蒙独立，中苏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租借大连港等项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条款。接着，苏联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换文中指出：苏联政府同意予以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物质之援助，此项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⑤。于是乎，蒋经国1945年12月25日至1946年1月14日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访苏。蒋介石之所以派自己的儿子访苏，是因为要对斯大林表示亲善。对于蒋介石对苏的亲善态度，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同蒋的关系，因此，斯大林又于1945年12月、1946年5月两次邀请蒋介石访苏。蒋介石在离开美国寸步难行的情况下，很害怕美国认为他“挟俄自重”，因而拒绝了斯大林的邀请。

中国内战爆发后，苏联仍把希望寄托于蒋介石国民党。直到1948年1月，苏联还“希望结束目前的内战，并在委员长（蒋介石）的领导下恢复和平。”并承认蒋介石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领袖。因而“苏联政府已通知最近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将军非正式地向政府的某些领袖建议苏联可出任斡旋，以使目前的内战得以协商解决。”^⑥这充分表明，苏联出面调解结束内战，其目的是要使国民党控制整个中国，幻想从美国怀抱中拉走蒋介石，有一个睦邻友邦。这是因为“苏俄最害怕的莫过于英美势力在苏俄边界扩张。……假若与苏联接壤的幅员辽阔，资源富饶的满洲，一旦落于一个第三大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就将大大加剧他们的不安。”^⑦

二

抗日战争胜利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建立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必然要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努力。然而，苏联则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所说：“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这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⑧社会主义的苏联为什么采取如此态度，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应当指出：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竭力维护苏联的利益。战后，斯大林不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也是为了生怕有损于苏联的既得利益。如上所述，苏联通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从蒋介石手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益，他当然不愿再看到爆发一场有可能导致失去这些利益的内战。《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指出：“斯大林担心中国发生内战，共产党人可能毁灭而国民党人将会采取反对苏联对满洲和外蒙古的要求的立场；或者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从而也可能对苏联的边疆要求和苏联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提出挑战。因此，他欣然完全赞同成

立联合政府。”^⑥因而，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三国外长一致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中国的统一和民主；必须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国民政府的一切机构并停止内战。”^⑦斯大林还致电中共中央，要中共放弃武装斗争，和国民党谈判，以避免内战和实现“统一”。并声称，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⑧。如果照此办理，哪里有共产党人的自卫权利？哪里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当蒋介石发动的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被粉碎，解放战争的形势正朝着对人民有利的方向发展时，斯大林仍试图运用自己的影响迫使我党交出武装，求得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在1948年2月他还认为，中共武装没有前途，应解散自己的军队，统一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人抵制了这一妥协的逆流，抓住有利的战略时机，进行了战略决战。三大战役后，解放了东北、华北和长江以北广大地区，蒋家王朝面临土崩瓦解。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斯大林却奉劝中共军队停止于长江一线，划江而治，形成“南北朝”的局面。因为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渡江，必然引起美国干涉。而美国的干涉，将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打破战后世界格局，这样就会把苏联牵涉进来，影响苏联的既得利益。正因为如此，1948年12月16日，司徒雷登还在他的报告中指出：“根据委员长所得的报告，美国人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有密切联系，也不相信苏联是在支持中国共产党。”^⑨

对于斯大林这种“划江而治”的劝告，毛泽东同志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给予了有力地回答。他指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蒋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受外国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千里江防，立即土崩瓦解。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三

中国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怀疑是“铁托式的胜利”。南京解放后，就连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大使馆都留在南京的情况下，苏联大使馆竟然尾随蒋介石南下广州。这最能说明斯大林对于蒋介石政权寄予了多么大的希望！从而暴露了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态度。因为中国革命胜利，苏联再也没有理由在中国保持雅尔塔会议所确定的特权了。这就是苏联怀疑中国革命是“铁托式的胜利”和1949年情报局加紧反对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的真正原因。

斯大林对于中共的不信任态度，在1949年至1950年的中苏最高级会谈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世界政治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了巩固人民民主和世界和平，中苏两国应该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因而，毛泽东同志亲自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准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一开始，毛泽东就表示想同苏

联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当时，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下的新生的人民中国需要苏联的援助，这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的这句话，应该说已经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但是，斯大林却一个劲地故意装糊涂。当毛泽东进一步说明打算请周恩来来莫斯科谈判具体问题的時候，斯大林还说：“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个什么事情，请周恩来来干什么？”^①其后几经周折，斯大林才同意周恩来去莫斯科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取代苏联同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以，毛泽东认为这是“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但是，“承认外蒙独立仍为新条约的基本精神”^②。也就是说，苏联仍要维护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不但如此，苏联还要求十月革命后白俄在我国东北开办的企业收归苏联国有。同时，谈判还涉及苏联在我国新疆的利益问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苏联在新疆开办了几个公司，有民航公司、石油公司和有色金属公司等。其中有色金属主要是铀，是制造原子弹的重要战略物资。苏方要求这些公司由中苏双方合管。苏方还要求在东北和新疆除了苏联外，不允许有第三国的势力存在。另外，苏方还将卢布的比值定得很高，而将人民币的比值压得很低。所有这些，当时我们从大局出发，都同意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苏联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于1954年访问中国，毛泽东同志曾问他：“当年你们在东北和新疆要了两个势力范围，现在还要不要？”赫鲁晓夫说不要了。^③

既然苏共、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如此恶劣，为什么中苏关系又能得以发展呢？这主要是中共坚持了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统一战线，断然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把独立自主原则同国际主义的联合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结果。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共在历史上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讲了：“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这样促成了战后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局面。这对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巩固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必须联合，同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历史经验证明，如果不把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统一起来，而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就不能不犯错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相结合。正因为如此，中共为了顾全大局，作出了最大的忍耐和牺牲，才使得中苏关系能得以保持并有所发展。

总之，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缺乏信心，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蒋介石而夺取政权。为了确保苏联已经获得的在华特殊利益，寄希望于蒋介石国民党，始终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关键时刻甚至不惜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代价，作了不少既违背社会主义的原则，也违背国际公理的事情，暴露了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正如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不破哲三所说，斯大林“把自己摆在沙皇政府继承人的位置上。”^④这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实质。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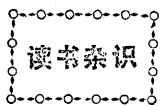
①《艾奇逊回忆录》第232页。

②《中苏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316页。

③《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三辑578页。

④同②，第161、162页。

- ⑤同②，第178页。
 ⑥同②，第608页。
 ⑦同②，第919页。
 ⑧《顾维钧回忆录》第485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86页。
 ⑩该书下册第734页。
 ⑪同③第569页。
 ⑫《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80页。
 ⑬《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908页。
 ⑭师哲《陪同毛主席访苏》。
 ⑮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央的电报》（1950年1月2、3日）
 ⑯邓力群《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中苏关系之一页》，《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⑰《斯大林与大国主义》第54页。



贺铸自编《庆湖遗老集》

大明

北宋著名诗人贺铸生前曾自编其诗集。据《庆湖遗老集》前附《庆湖遗老诗集序》，记其七岁学诗，至哲宗元祐三年（1088），三十年间得诗不下五、六千篇。以为多妄作而多次烧掉。后“哀拾其余而缮写之”，“后八年仅得成集九卷”。是为《庆湖遗老前集》，而将元符三年（1099）以哀的诗作编为《后集》。此事又参其子方稟所撰跋文（在宣秋馆刊《宋人集》乙编《庆湖遗老集》附《后集补遗》）。而《前集》编成的时间，学术界有的订为哲宗绍圣二年（1095），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贺铸”条即如此说。今案：《前集》所编诗作，多自注赋诗年月日。依据这些时日可知贺铸自编其诗终于元符元年（1093）。前引《庆湖遗老诗集》云“后八年”，乃指作《序》时是元祐三年之后八年（绍圣丙子，公元1096年），此后继续编诗，而终于元符元年。据是集卷四之末《和潘幽老汉上属目》诗，自注：“戊寅四月江夏赋。”此年即元符元年。卷九之末《题诗卷后》，自注：“戊寅三月江夏赋”，亦为元符元年；而曰“题诗卷后”，即指所编《前集》也。而此集之编成，又在元符三年（1100）。卷五之末为《寄题盱眙杜子师东山草堂》诗，自注云：“丙子（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三日临淮赋，偶亡之。庚辰十月再道临淮，复得于子师，因附卷末。”由此可知铸成《前集》乃在庚辰（元符三年，公元1100）十月之后，故有将此诗“附卷末”之说。所谓《前集》编成于绍圣二年（1095）之说，应该据以校正。